

分类号：
密 级：

单位代码：10422
学 号：0591-0170729



山东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Shandong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论文题目：
由封建买办到爱国企业家
——试析郑观应社会角色的转变

**The Transformation of Zheng Guanying's Social Role
——from Feudal Comprador to Patriotic Enterpriser**

作 者 薛海峰

专 业 中国近现代史

导 师 吕伟俊 教授

合作导师 _____

2008 年 10 月 15 日

分类号:

单位代码: 10422

密 级:

学 号:



山东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Shandong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论文题目:

作 者

者

薛海峰

专 业

业

中国近现代史

导 师

师

王伟俊

合作导师

年 月 日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薛海峰 日期：2008.10.20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印刷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山东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薛海峰 导师签名：刘建波 日期：2008.10.30

目 录

中文摘要	3
ABSTRACT	4
引言	5
一 郑观应及其社会角色的变化	11
(一) 郑观应.....	11
(二) 郑观应社会角色的变化.....	13
1. 郑观应的买办生涯	13
2. 郑观应的转变过程	15
3. 郑观应的爱国历程	17
二 促使郑观应社会角色转变的因素	23
(一) 时代因素.....	23
(二) 地域因素.....	26
(三) 家族因素.....	27
1. 郑观应和父亲郑文瑞	28
2. 郑观应和诸兄弟	29
3. 郑观应和儿子郑润林.....	30
(四) 性格因素.....	32
三 郑观应的思想主张和社会角色转变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意义.....	34
(一) 郑观应富强救国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34
(二) 郑观应思想主张及其现代启示.....	37
(三) 郑观应社会角色的转变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40
结 论	43
参考文献	45
致 谢	49

CONTENTS

Abstract in Chinese.....	3
Abstract in English	4
Introduction.....	5
1. Zheng Guanying and his transformation	11
1.1 Zheng Guanying.....	11
1.2 The transformation of Zheng Guanying.....	13
1.2.1 The feudal comprador life of Zheng Guanying	13
1.2.2 The changeable process of Zheng Guanying.....	15
1.2.3 The patriotic process of Zheng Guanying	17
2. The reason of Zheng Guanying's transformation	23
2.1 The reason of time	23
2.2 The reason of district	26
2.3 The reason of family	27
2.3.1 Zheng Guanying and his father Zheng Wenrui	28
2.3.2 Zheng Guanying and his brothers	29
2.3.3 Zheng Guanying and his Son Zheng Runlin.....	30
2.4 The reason of disposition.....	32
3. The merit of Zheng Guanying's thinking and transformation for today	34
3.1 The merit of Zheng Guanying's "saving China by rich and powerful" for today	34
3.2 The merit of Zheng Guanying's thinking for today	37
3.3 The influenc of Zheng Guanying's transformation	40
Conclusion	43
Bibliography	45
Acknowledgements.....	49

中文摘要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出身于买办而逐渐走上维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他广泛参与近代工商业的实践，集洋行买办、民族企业家、改良主义思想家于一身，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外患内忧加剧的时代形势下，在家族和本土爱国文化的熏陶中，他把丰富的社会实践与拯救民族的爱国行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了达到“富强救国”的目的，使中国早日“登于富强之境”，他广泛参与社会实践，特别是经营近代工商业，并在其“实业救国”的爱国历程中，逐步实现了由封建买办到爱国企业家的身份转变。郑观应认为要使中国真正富强，必须进行变法维新。他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极力呼吁自强救国。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具有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当时广大爱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并对以后的改良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郑观应还主张跟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业竞争，主张用经济手段来抵制外国侵略。他强调“以商立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提出了“商战论”。郑观应以一位实现从洋行买办向近代商人、从传统知识分子向爱国企业家转变的形象，成为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进程中留下深刻痕迹的历史人物。

本文既探索了郑观应由洋行买办向爱国企业家转变的这一重要过程，也对促使郑观应社会角色转变的因素以及郑观应社会角色转变的意义进行了探析，并对郑观应的思想特别是“富强救国”思想的现代启示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认识。系统研究郑观应由洋行买办向爱国企业家转变的这一重要过程，深刻阐释郑观应矢志不移的爱国情怀，既可为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又可为教育工作者在开放时代、多元化社会背景下如何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教育和引导青年一代健康成长提供有价值的案例和启示。

关键词：郑观应；买办；爱国企业家；角色转变；社会实践；实业救国

ABSTRACT

Zheng Guanying, a famous patriotic enterpriser in neoteric China, first comes of a feudal comprador and then gradually transforms to a neoteric capitalist. He is a synthesis of a comprador, national capitalist, and reform-advocator, who plays a quite important role in neoteric China. Facing the distressful country and terrible situation, he is affected by his family and patriotism. As a result, he combines his social practice with patriotism and takes an active part in all kinds of social activities to make China rich and strong. It is in the course that he fulfill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feudal comprador to a patriotic enterpriser. Zheng Guanying believed that if we wanted to make China prosperous and powerful, we must carry out political reform. He put forward the political reform and strongly called for self-salvation. His reformist ideas were a kind of patriotism with against aggression, reflected the hopes and demands of the patriotic popular masses and affected the future reformist. He also advocated business competition with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for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 He stressed "developing China by building business" and insisted developing nation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He put forward "Commercial War". Zheng Guanying had left a deep mark in Chinese history.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that Zheng Guanying changed from feudal comprador to patriotic enterpriser, and expound the reason of his change. Meanwhile, this article explains his thinking, particularly, his "saving China by rich and powerful". The changeable process of Zheng Guanying is meaningful for today.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 feudal comprador; patriotic enterpriser; transformation; social practice; saves the country by industry

引 言

郑观应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与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他的一生与近代中国的国家命运、民族利益紧密相连，他的生平和著述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法学、教育、军事、新闻等多个领域，他的实践活动和思想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均受到了他的影响。正因为如此，郑观应成为了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自1921年学者们开始研究郑观应至2001年纪念郑观应逝世80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已出版有关研究郑观应的文集2部，论著3部，论文160余篇(含澳门版《纪念郑观应学术研讨会文集》所收论文，台湾地区及海外未计)。重要的是学者们还多次召开纪念郑观应的学术研讨会，共同探讨对郑观应的研究，如1992年8月纪念郑观应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1997年8月纪念郑观应诞辰155周年学术研讨会、2001年7月纪念郑观应逝世8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2年7月纪念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讨论会等，其中2002年7月纪念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此次研讨会由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澳大利亚的110多名学者提交了100多篇论文，此次所提交的论文是前3次所提交论文的近3倍之多。^①这些研讨会中所提交的论文，内容涉及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文化史、教育史、新闻史、宗教史、医学史、社会史、区域史等学科类别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民初政争等历史事件，视角揽括了郑观应的身世、家族、思想、信仰、事业、品格、人脉、养生等层面，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对郑观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关于对郑观应研究的成果，在本世纪初就已有学者进行了总结，如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王杰先生2002年写了题为《郑观应研究的里程碑——“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的综述性文章，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倪俊明先生2003年在《文史哲》上发表了《郑观应研究综述》一文。《郑观应研究的里程碑——“郑

^① 王杰：《郑观应研究的里程碑——“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岭南文史》，2002年03期。

观应诞辰 160 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一文，从对郑观应的总体评价、郑观应的政治思想、郑观应的商战思想、郑观应的商务活动、郑观应的外交思想、郑观应的法律思想、郑观应的新闻思想、郑观应的医学和养生思想、郑观应的诗歌创作、郑观应与同仁的比较研究（包括孙中山、薛福成、王韬等）、郑观应与区域研究（包括郑观应与香山、澳门、香港、南洋等）、郑观应的新史料的发掘等方面，全面概括了 2002 年“郑观应诞辰 160 周年学术讨论会”关于郑观应的研究成果。^①《郑观应研究综述》一文，是对 1949 年到 2003 年（倪俊明先生发表此论文之前）关于郑观应研究状况的概括总结，该文章分别从有关郑观应的专著与文集、郑观应生平与思想的综合研究、郑观应与戊戌维新运动、郑观应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郑观应的哲学思想、郑观应的文学思想等七个方面，分门别类地整理、归纳、介绍和分析了有关郑观应研究的成果。^②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更多学者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新的学术理论、新的研究史料、新的领域内对郑观应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因此，从 2001 年至今，学者们的相关论文不仅有对旧论题的拓新，而且还有更多对新领域的开辟和新史料的研作，“可谓涉前人之未涉、发前人之未发”，堪称郑观应研究的又一次大面积丰收。^③以下将就二十一世纪以来学者们对郑观应的研究进行简单的概述。

首先，郑观应虽兼有外国洋行买办、民族资本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洋务大臣四种身份，但是这四种身份都使郑观应走不出“商人”的圈子，也就是说郑观应首先是一位商人，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经济思想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也是最有成就的思想，而“商战思想”又是其经济思想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也是历来学者们研究最多的思想之一。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仍然还是学者们主要关注的研究对象，比如孙玉珂和李玉传的《略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汤照连的《郑观应：近代“商战论”的主要代表者》、郭红娟的《试述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吴艳杰的《郑观应“商为国本”思想浅析》等

^① 王杰：《郑观应研究的里程碑——“郑观应诞辰 160 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岭南文史》，2002 年 03 期。

^② 倪俊明：《郑观应研究综述》，《文史哲》，2003 年 01 期。

^③ 王杰：《郑观应研究的里程碑——“郑观应诞辰 160 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岭南文史》，2002 年 03 期。

等。此时间段内，学者们对郑观应的“商战”思想的阐释更多的是倾向于：“商战”是反对侵略、抵御欺凌、重振国威，“商战”实质上是指通过“经济战”来对抗外国的经济侵略。如孙玉珂在《略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一文中说：在外国商品和资本不断涌入中国之时，郑观应认识到了‘商战’的必要性，并且提出了种种与外国势力进行“商战”的措施，建立了一个比较全面而且独具特色的发展资本主义民族经济的思想体系。^①郭红娟在《试述郑观应的“商战”思想》说：郑观应先生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文化的冲击之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战”思想，而“机器制造业、以‘商’立国、行‘励商之法’、‘开议院’与‘设商部’等是其‘商战’思想的主要内容”。^②这些对郑观应“商战”思想的论述，更多的是倾向于其对于现实社会的意义。除此以外，学者们也关注了郑观应其他的经济思想，如杨华山的《论中国近代早期的企业人才观念和市场意识—郑观应个案分析》、线文的《郑观应、李斯特经济思想比较初探》、聂好春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从〈盛世危言〉看郑观应的经济思想》、赵善轩的《郑观应“专利经营”建议及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实践》、范耀登的《略论郑观应的行政管理思想》等等。这些成果更多的是用现代的经济思想和理论来研究和阐述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此时，学者们已经把视线放到了郑观应的人才观、企业管理等思想。

其次，郑观应的“教育思想”也开始得到学者们的青睐，这一时期的相关论文有：王丹的《浅评郑观应的女子教育观》、郑世巧的《浅析郑观应的教育思想》、刘振宇的《郑观应职业教育思想简论》、张君玉和李锋的《郑观应的教化思想》、冯雷的《浅论郑观应的教育观念》、周冬梅的《郑观应的女子教育观—兼与孙中山的女子教育观比较》、王令云的《郑观应职业技术教育思想初探》，管林的《试论郑观应的教育思想》等等，还有冀海银的硕士论文《郑观应教育思想研究》。郑观应的“教育思想”在二十一世纪之前少有学者研究，二十一世纪之后始得学者青睐。郑观应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是对郑观应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学者们不仅从整体上探讨郑观应的教育观、教育思想，还从微观上研究了郑观应的女子教育、职业教育等。关于女子教育，王丹在《浅评郑观应的女子教育观》一文中说：

^① 孙玉珂、李玉传：《略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02期。

^② 郭红娟：《试述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01期。

郑观应先生“反对溺女、反对裹足，要求男女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主张让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等等；他还认为：“女子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做个贤妻良母，相夫教子”。^①关于职业教育，王令云在《郑观应职业技术教育思想初探》一文中说：郑观应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在职业教育观念上他主张要“务实”“戒虚”；主张对西学要“体”“用”兼备；主张在中国实行职业技术教育和贫民教育。^②

再次，关于郑观应法律思想研究的文章有朱作鑫的《郑观应的法律思想》、刘倩的《从〈盛世危言〉看郑观应的法律思想》、孟红的《郑观应法律思想简论——以〈盛世危言〉为研究对象》、熊命辉的《论郑观应的国际法思想》、龙天贵的《郑观应法律思想述评》、施建兴的《略论郑观应司法改革思想》、乔素玲的《郑观应与西方法律观念的移植》等等。其论述主要有：“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等代表著作中，较系统地阐述了国际法的本质、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法律责任、国籍法、外交及领事关系法、条约法、战争法及国际法在中国得以实施的前提等内容，是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国际法思想体系的第一人。”^③郑观应的法律思想主要是“提倡民权，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恤刑狱，改革法律从业者制度，审判公开公正，对犯人实行人道主义管理”等等。^④

第四，关于对郑观应救荒和慈善思想的研究，近年来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如王超的《浅议郑观应的救荒思想》、张大伟的《郑观应防灾备荒思想探析》、钟霞的《论郑观应的荒政思想》、余新明的《郑观应救助弱势群体的策略分析》、刘正刚的《郑观应关注弱势群体言行探析》、田珂的《论郑观应慈善思想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启示》、陈国威的《试论郑观应的慈善观》等等。郑观应面对晚清频频发生的灾荒，积极寻找防灾备荒之策，他主张“利用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方法治理水旱灾害；主张建立银行保险机关，提高社会抗灾能力”。^⑤不仅如此，郑观应还主张发展慈善事业，并倡导种种慈善之举。研究郑观应的慈善思想对今天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① 王丹：《浅评郑观应的女子教育观》，《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03期。

^② 王令云：《郑观应职业技术教育思想初探》，《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01期。

^③ 熊命辉：《论郑观应的国际法思想》，《株洲工学院学报》，2005年02期。

^④ 龙天贵：《郑观应法律思想述评》，《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02期。

^⑤ 张大伟：《郑观应防灾备荒思想探析》，《岭南文史》，2006年04期。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郑观应的警政、监察吏治、边防、外交、医学、“道”“体”、电报建设、新闻、图书管理、民族观、文化、政治等思想。如冷光伟的《郑观应警政思想述评》、朱作鑫的《论郑观应的监察吏治思想》、《郑观应边防思想述论》、李天莉的《郑观应医学思想简析》、陈传的《郑观应—倡导中西医合璧的先驱》、伍国的《郑观应思想中的“体用”与“道器”》、夏维奇的《试论郑观应的电报建设思想与实践》、朱根的《郑观应的日报观论略》、伍国的《郑观应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刘应芳的《郑观应的现代图书馆思想》、汪菁华的《郑观应外交思想述论》、张泽洪的《郑观应的政治改革观》等等。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郑观应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从研究成果上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共发表专著、文集、论文、资料约有80篇之多。从时间上来看:其中50—60年代为13篇,70—80年代为43篇,90年代到2001年为89篇,2001年至今有128篇之多,学者们对郑观应的研究呈不断上生的趋势;^①从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来看,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拓宽,包括对郑观应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法律、教育、文学、人才、新闻、国防、医学、慈善、图书管理等等诸多方面思想的研究。但是,关于郑观应由洋行买办到爱国企业家的转变这方面,学者们还未作太多研究,或者说言之甚少,本文将就此进行探讨。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部分进行论述:一、郑观应及其社会角色的变化。(一)郑观应。(二)郑观应社会角色的变化。1、郑观应的买办生涯;2、郑观应的转变过程;3、郑观应的爱国历程。二、促使郑观应社会角色转变的因素。(一)时代因素。(二)地域因素。(三)家族因素。1、郑观应和父亲郑文瑞;2、郑观应和诸兄弟;3、郑观应和儿子郑润林。(四)性格因素。三、郑观应的思想主张和社会角色转变对现代社会的启示。(一)郑观应富强救国思想及其现代启示。(二)郑观应思想主张及其现代启示。(三)郑观应社会角色的转变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全文始终贯穿的最高层次的研究方法,在对各个问题的阐述上,坚持将历史的分析与逻辑的分析相结合,坚持把研究对象放在与社会及历史的紧密联系中进行研究。同时,在唯物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指导下,运用科学系统论方法。科学系统论方法主张

^① 倪俊明:《郑观应研究综述》,《文史哲》,2003年01期。

把一切对象作为一个系统，从系统与它存在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以求获得对问题的最优处理。

一 郑观应及其社会角色的变化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加剧，国势险恶，几陷万劫不复的境地；但那也是志士崛起、豪俊辈出的时代。作为一位从广东香山走出的历史人物，郑观应长期致力于近代工商业，以求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他积极投身赈灾慈善活动和爱国救国运动，以期富强救国。他撰写的《盛世危言》见解深刻，影响深远。

但是，“在众多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郑观应都被作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加以历史定位”。^①如果转换视角，我们就会发现，郑观应经历特殊、阅历丰富，具有多重社会角色，并且其社会角色互有交叉和转换。作为洋行买办，他是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中国人之一，并实施了从买办到改良主义者的人生转折；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具有完整的维新思想体系，同时又是揭示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家之一；作为实业家，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他集实业开拓、实业经营、实业管理于一身，是实业界先驱；作为爱国企业家，他以爱国为根本，商战为核心，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问题相联系，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视为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一）郑观应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待鹤山人，广东香山县雍陌乡（今中山市三乡镇）人，晚清著名实业界先驱，中国近代改革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郑观应生活在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并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他是一位富有社会实践尤其是经营近代工商业实践的民族资

^① 姜义华：《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澳门：《郑观应诞辰 16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 年。

本家，也是中国近代具有较大影响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实业家，更是一位爱国的民族企业家。他一生经营实业达 60 多年之久。

郑观应的父亲接收西方新思想较早，他不拘于传统思想，眼界开阔，处理事情比较前卫。1858 年，在父亲的指导下，郑观应远游上海，从此弃学从商，开始了经商之路。郑观应起先在叔父郑廷江那里当杂役。1859 年，郑观应进入了上海英商宝顺洋行工作，到这里工作不久，他便被派到天津考察商务。由于在考察期间表现出色，郑观应在返回上海之后，便被委派掌管英商宝顺洋行的丝楼，同时还兼管轮船揽载等事项。青年时期的郑观应并未安于现状，他意识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到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同时他还广泛涉猎西方各方面的文化，如西方政治、西方经济等等。1868 年，英商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开始投资轮船业。1874 年，他受聘为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担任总理之职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项。同时郑观应也开始了更多的实业投资，如先后参股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在这段时期，郑观应还纳资捐得郎中、道员等官衔，也进入政界。1878 年，郑观应受李鸿章的委托开始帮助洋务派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并参与上海电报局的创办。1882 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的聘期期满后，他接受李鸿章的建议，离开了太古洋行，担负起了管理轮船招商局事务。上任之后，郑观应针对当时上海轮船招商局的现状提出了“救弊大纲”十六条，他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并付诸实施。他还与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签订了齐价合同，制止了“削价竞争”。正是由于他有效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从而成功地帮助上海轮船招商局脱离了困境。因此，李鸿章进而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之后，郑观应自荐为国家效力，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并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且谋划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事宜，还条陈对法作战建议七条。于此同时，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之后，郑观应的人生进入低谷。

作为一个思想家，郑观应一生著述颇多，最有代表性的是《易言》和《盛世危言》。《易言》于1880年编定并刊行，此书反映了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建议由政府组织人员翻译西方的富国强兵的相关书籍，以便于西方文化在中国大地的广泛传播。他还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他还大力宣扬西方议会制度，主张中国实行政治制度改革，推行君主立宪制。1894年，郑观应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盛世危言》。《盛世危言》问世，恰逢甲午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民族危机深重之时，因而很快轰动了社会，好评如潮。一时间，京城内外掀起了一股《盛世危言》热，就连光绪皇帝也“不时披览”，并命总理衙门印刷两千部散发给大臣们阅看。而郑观应自己排印的500部，也很快就被求索一空。求书者仍“络绎不绝”。《盛世危言》被不断再版，其版本多达20余种，创下中国近代出版史之最。

（二） 郑观应社会角色的变化

1. 郑观应的买办生涯

1858年，不满十七岁的郑观应参加科举考试落榜。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毅然让他到上海去当买办。到上海后，郑观应先到新德洋行，后又转到宝顺洋行，当的都是一般的小买办。宝顺洋行又名颠地洋行，是上海开埠后首批进入上海的外国洋行之一。宝顺洋行以向中国输入鸦片和输出生丝、茶叶为主要业务。郑观应进入宝顺洋行后，勤奋自励，很快就获得了信任。

1859年冬，郑观应跟随外国商人去天津考察商务，他以“在津度岁，大雪漫天，身亦只衣布棉袍，素位而行，耐苦自励”的刻苦耐劳精神，在回到上海后马上被提拔为管理丝楼和轮船客载事务的主管，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①

1865年7月12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上海《北华捷报》上刊登广告：“目前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交往已经很频繁了，要尽可能地促进和发展这种交往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之故，在沪外侨决定在英租界内开设一所高标准的、有才能和有

^①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效管理的学校。”^①并由此创办上海英华书馆，这也是上海最早开设外语课教学的学校。此时的郑观应清醒地意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不通晓英文，不掌握一门技艺，不可能获得足够多的薪水。于是，他利用闲暇时间进入上海英华书馆夜校上课。

1872年，上海的太古洋行创办太古轮船公司。郑观应于1874年2月被聘到该公司任职，全面负责揽载客货并兼管账房和栈房等事务，不久晋升为总买办，总买办的收入十分丰厚，年薪加上佣金、分红和投资所得，总收入在100万两白银以上。此时的郑观应身份显赫、资金雄厚，很快跻身于上海社会名流界。郑观应虽然跻身于买办阶层，但仍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不与一般买办同流合污，其买办生涯积极向上。郑观应对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横行不法颇为愤懑，他表示洋人“既入我中国营生，当依我中国规矩，何以洋人入我中国营生，渔我中国之利，反不循我中国之规矩？”^②他极力揭露外国“贩人出洋之举”和奴役华人的罪行。他慷慨大义，关注社会，积极参与上海商界的筹捐赈济灾民活动，这使他迅速融入了上海的江浙绅商社会，并和上海赈务活动的头面人物盛宣怀有了直接而密切的交往。

“郑观应的精明才干和十多年洋行买办的身份背景，很快赢得了洋务要员盛宣怀的好感和李鸿章的赏识，由此开始了从洋行买办到改良主义者的人生转变。”^③郑观应先后被李鸿章委派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分局总办和轮船招商局帮办等洋务职务。1882年，郑观应辞去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的职务，努力致力于经营近代企业，并把西方的经营管理经验推行到企业管理中，利用招股、专利等手段进行经营和整顿，颇具成效。这个阶段，郑观应还与人集资合办了天津塘沽耕植畜牧公司，耕植全部采用西方的方法和机器进行。他还参股投资于煤矿、金矿、玻璃公司和书局等。至此，郑观应已经转变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资本家。他功成名就，志得意满，于是荣耀故里，并在澳门置地建房，修建了占地面积4400余平方米的郑家大屋。

^① 北华捷报馆：《华捷报》，1850年。

^②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③ 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杰出历史名人与澳门（3）郑观应》，北京：2006年11月8日。

2. 郑观应的转变过程

郑观应是晚清著名的实业界先驱，一生经营实业达六十年之久。他也是中国提出“商战”思想和开议会的第一人。

1881年，郑观应在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工作合同到期之时，是他从一个封建买办到爱国的近代民族企业家转变的一个关键的时期。此时期对郑观应来说也是人生面临艰难选择的时期。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郑观应应该继续走买办之路，继续为洋人服务，从而无拘束地发挥自己的商业才能呢？还是该选择转为祖国的洋务派，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者，专心经营洋务事业，从而实现富强救国的理想呢？最终，他从内心深处做出了他最想要的也是其一生最重要的决定。

郑观应十七岁离家到上海谋生，他从在外国洋行当杂役开始，凭借着勤奋努力和聪明才干，最终在三十三岁时（1875年）当上了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总理，即总买办。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郑观应认识了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李鸿章亦非常欣赏郑观应。郑观应既关心时事，忧国忧民，又有振兴祖国的宏图大志，所以李鸿章就委任郑观应为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会办，让郑观应参与创办了中国的第一家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厂。随后，李鸿章发现了郑观应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便将其升任为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总办。^①力图通过上海机器织布局，由郑观应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设备及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模式和方法，从而办好当时我国少数的民族企业，也为振兴我国的民族企业铺平道路。

时至1881年，郑观应不但在洋行里的买办事业得到了更大发展，而且也在洋务企业中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在郑观应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工作合同即将期满之时，郑观应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和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签订合同，还是应该离开英商太古轮船公司而全身心地投入到洋务企业中？此时，主持名闻中外的洋务大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和会办徐润发发出邀请，请郑观应帮助他们办理上海轮船招商局事务。同时，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冷士也唯恐郑观应被上海招商局拉走，怕失去这员得力大将，也极力挽留郑观应，并且做出承

^①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诺：如果郑观应在太古轮船公司工作时间达到二十年以上，郑观应在年老退休后，太古轮船公司将给他半薪养老。李鸿章为了拉拢郑观应到洋务企业，在 1881 年 9 月，向朝廷上奏了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及郑氏全家的赈灾义举，并恳请朝廷恩准将此事写入广东省志和香山县志。李鸿章的这一举动使郑观应深受感动。

面对洋行和洋务企业各自许诺的优惠条件，郑观应还考虑到：一、他希望自己能够加入到振兴祖国民族工商业的队伍中，从而实现国富民强的愿望，而加入到上海轮船招商局则可实现这一愿望；二、在英商办的太古轮船公司工作，可以放宽心地工作。因为太古轮船公司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方式，这里没有长官意识，也没有衙门风气，更重要的是太古轮船公司按合同办事，只认个人的才能而不管私人之间的关系。总之，在这里工作是比较公平的，也足以使郑观应放心、宽心；三、虽然上海轮船招商局也非常重用郑观应，但是他还是怕有朝一日官僚们听信了排挤他的小人谗言，不问是非，不念旧情和往日办事者的辛劳而加祸于他。他又考虑自己生平不善于钻营，到时自己不知该如何处理祸患。到底是该何去何从？郑观应陷入了异常激烈的思想斗争当中。但是，郑观应还是放不下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他希望国家富强昌盛，他企图通过振兴民族的工商业来振兴祖国。对祖国热爱促使郑观应放弃了在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工作的优越条件，最终选择了在祖国的洋务企业里为振兴祖国的民族企业而奋斗。^①

郑观应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转入到上海轮船招商局工作，且不论这种工作的转换对他自己的人生事业意味着什么，总之，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转换实现了他由一个为外商工作的买办向一个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的转变，这一转换同时也是他向爱国的民族企业家转变的开始。自此之后，郑观应开始将他的振兴民族工商业、实现富强救国的理想付诸实施。

郑观应从事民族事业的首要任务便是经营好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轮船招商局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洋务企业，它那时已是扬名内外，并且也只有它才具备与国外的轮船公司在中国的江河海面相竞争的实力，也只有它才有能力从外国商人那里为中国的航运业争回一些权利。所以，郑观应便以上海轮船招商局为阵地，开始为争回中国在航运业中的权利而战。在多年经商经验的基础上，郑观应通过

^①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实际观察和深入思考,认识到要想振兴民族工商业必须争回中国在任何方面上的主权,而收回自己权利的最好方式是“商战”,即“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商战重于兵战”。为此,郑观应提出了他的“商战”三战略:“中西可共之利,思何以筹之;中国自有之利,思何以扩之;西人独擅之利,思何以分之。”郑观应在航运上帮助上海轮船招商局摆脱困境后,又转入争取国家电报事业的权力,并且担负起了发展中国电报事业的重任。1881年之前,由于清政府的反对,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电报事业,仅在沿海的通商口岸有部分外国的电报公司。1881年,李鸿章呈请清政府设立电报线得到允许,于是下令由盛宣怀承办,由郑观应协办了天津电报局,由此开始了中国的电报事业。鉴于西方国家对我国沿海地区电报线的垄断,郑观应首先想到的是要为中国电报事业的发展争取足够的生存空间,于是他开始了为保障中国内陆电报线的自主权而与洋人的交涉,最终通过谈判和赎买的方式保障了中国内陆的电报线的自主权。^①以上便是郑观应在从事洋务事业之初振兴民族工商业、富国强民的实践。

纵观郑观应的转变过程,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与李鸿章的认识,是其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也是其事业的鼎盛期。在李鸿章等人的提携下,郑观应后来又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入主轮船招商局,其履历不一,且均有不凡之举。及至中法战争爆发后,郑观应主张积极抗击法军,并潜往西贡、金边等地侦察敌情,还组织船只运送军队、军械。再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郑观应强烈反对向日乞和,提出多项建议,并将招商局部分船只拨作军用,巧妙依托外国洋行,使招商局船只照常行驶。总之,郑观应在由买办转向民族企业家之后,也开始一点点地展露他的爱国之心,并且也一步步地实践他的富强救国的理想,从而最终从一个买办成为了爱国工商巨子。

3. 郑观应的爱国历程

郑观应幼时跟随父亲饱读孔孟之书,且心怀大志,他的一位朋友曾回忆说:郑观应“幼读书,有大志”。^②他的言谈举止中都显示出他以“救世”为己任的

^①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邵循正:《论郑观应》,《光明日报》,1964年。

抱负。郑观应从小生活在外国侵略者的巢穴—澳门之旁，又隔着珠江与英国殖民地—香港遥遥相望，他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为将来以“救世”为己任打下了感性认识的基础。并且在郑观应积极经营轮船招商局等实业之时，中国大地上爆发了法国侵略越南、中国的战争。在强敌压境之际，郑观应采取了积极抵抗的态度和行动。他曾多次向老朋友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处善理湘军营务的王之春表示：自己愿为抗击法国，保家卫国出力。王之春把郑观应推荐给彭玉麟后，郑观应又向彭玉麟自荐。1884年3月22日，郑观应被彭玉麟派往琼州（今海南岛）总理那里的一切事务，并兼署雷琼的湘军十四营务处的事宜。实际上郑观应本想利用他和南洋一带的亲朋关系，到那里侦察敌情，并计划同那里的壮士联合共同袭击法国侵略者。因为在1883年，郑观应曾经为了整顿和发展轮船招商局的南洋航业，亲自到南洋考察过业务，也正是因为此，郑观应对南洋那里的人员等情况都比较熟悉，这也是他想到南洋侦查敌情的原因。最后当清政府在前线节节败退之时，彭玉麟为了挽回败局最终决定派郑观应前往南洋侦察敌情，郑观应也因此欣然接受了重要而又危险的任务。1884年6月11日，郑观应拜别彭玉麟，坐保安轮船于第二天到达香港。随即附搭法国轮船离开香港，于6月16日到达西贡。在作了一些布置后，于第6月17日乘船前往新加坡，与事先预定帮助策划的陈金钟相见。陈金钟是中国人，任暹罗（今泰国）驻新加坡领事兼中国轮船招商局新加坡分局总办，本来对郑观应的此行抱不支持的消极态度，但在郑观应的严厉批评和热切鼓励下，最后表示愿意与暹罗当局联合起来抵抗法国侵略者。后来，虽越南被法国占领，但郑观应仍积极往返于新加坡、槟榔屿、西贡等地为联合抗敌而奔走。尽管目的未达到，但郑观应冒险救国的精神，却是值得称颂的。

郑观应除了为抗法做行动上的努力外，还根据自己多年与法国人的交往所了解到的情况不断地上条陈、提建议，希望抗法战争能够取得最后胜利。首先，他提出了对处理琼州事务的主张，建议重视琼州，认真整理琼州防务事务等。他认为法国侵略者之所以能够敢万里迢迢来侵犯中国，所依持的就是中国邻近的地区和国家。他说：如果说南洋是法国侵略中国的根据地，那么琼州则是它窥伺中国的重要桥梁。法国侵略者对琼州垂涎已久，中国必须立即加紧在那里进行防务上的整顿。在经济上他讲到，琼州森林矿产丰富，政府应招商集股开采，采取“奖

励引诱”的方法，将森林矿产开采出来销售，一方面利国利民，且免于外国人的掠夺，另一方面，可改善当地黎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使其成为巩固边防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次，郑观应主张广练民团以御外侮。中法战争期间，郑观应将他的这一想法用于实践，在分析了当时危机形势的基础上，认为强敌压境，单靠国家的防军是远远不足以应付的，因此政府必须立即招集各省之民，选将才，练民团，授以武器，以补充兵力之不足。郑观应的这种民团思想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寓兵于农”的思想，而且进行了创新，扩展到“寓兵于士工商贾”，并对民兵进行严格的军事和政治训练，做到“处处团防，村村联络，声势相应，休戚相关”。再次，他还提出了培养军事人才和调整军事部署的建议。早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初，他就建议设立水陆军学堂。他说中国的武器装备有两个缺点：一是到西洋学习军事的人，虽然饱学军事之道，但是却脱离实际并不能学以致用；二是中国的一切军事武器，包括弹药船械等均是外国购买的，太容易受他人的牵制。对此他提出了解决办法：用西洋人培养人才的办法，在沿海合适地点设立水师学堂，各省都要设一所陆军学堂，并聘请英、德、美、法等有名的且对我国强兵富国事业热心尽心的人为师。至于器械等军备问题，须赶快设厂自造，但必须真正由精通技艺的人主持工作，以免误国。郑观应不仅是一系列抗法措施的积极建议者，而且还身体力行、付诸实践。1884年秋，郑观应从南洋回到广东之后，法军就开始对台湾发起了进攻，他被委派办理援台事宜，主要负责办理转运事宜，即利用他与中外商人的关系，到香港租轮船运军队、运粮饷，以便有效地接济沿海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为了信息灵通，避开法国轮船的阻挠，他以港商的名义租外国轮船，除装载客货往来于香港、琼州、廉州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军事上的信息通畅和武器装备的装载。同时，郑观应还向彭玉麟请求亲自带兵千人，以作牵制法军的力量。所有这一切都是郑观应爱国至深和救国甚切的证明。

当郑观应经营轮船招商局步步致胜，以期在商战中与帝国主义一争高低之时，中日甲午战争又爆发了。日本为了吞并朝鲜，并加紧侵略中国。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面对清政府的节节败退，郑观应在1894年10月，向盛宣怀提出了自己“挽救民族危亡”的《管见十条》，系统地陈述了他积极抗战、保家卫国的思想。

第一，严防奸细。甲午战争爆发之初，郑观应就看到了日本特务活动的猖獗。中日宣战后的几天中，他根据飞鲸轮买办的报告，向盛宣怀详述日本奸细活动的情况。其中说到中国地方当局不但听任其自由活动、四处刺探我军情报，即使万一被查，也对其处理过宽。“如有些日本奸细，混迹城市，或做小生意，或做衙门仆从，在进行刺探军事秘密等非法活动中被捕，处理办法竟然是交回本国领事馆罚款一元五角就当场释放，而与日本人同谋的中国人也随即释放。如此，奸细胆子愈来愈大，对我国战事极为不利。”^①为了提醒中国官民在国际上不容外奸活动，郑观应还汇刻了《万国公法》中与此有关的部分，并编辑成册送到官府，送给商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了解国际公法的条文，不致被外国人轻视，同时借此来保护自己。《万国公法》对当时一个弱国来讲虽然未必能起多大作用，但《万国公法》却是郑观应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做出的努力，也以此表达了他的一腔爱国之心。

第二，强调政府要严密控制电报不准为侵略者服务。中国政府虽然对外国在中国的电报局难以干预和控制，但是中国政府应当严格控制中国自己办的电报局。他还奏请清政府传谕中国电报局：严戒不得与日本人往来，为日本人打电报及泄露电报给日本人，各局总办应派人密查，如有人违犯，即照军法从事，不能稍为姑息。

第三，严谨从日本船只进入中国港口，中国人也绝不能买日本的商品。以此来防止日本奸细的混入，同时还可以禁止日本商品的进口。因为日本的军事支出全靠商业税收来维持，所以不用日本产品，不与其通商，一方面可以限制日本的军费开支，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扶持了我国的民族企业，进而也为增强我国的军事力量提供了条件。

第四，强调中国要严密监视日本兵船的活动，并且应当扣留换用别国国旗的日本船。中国政府应当加派人员对沿海、沿江地区特别是长江口岸进行监视和巡逻，因为长江口岸是日本人主要的出入地。如果发现日本兵船到我国近海，即行通知吴松、上海等地提高防备。对日本的轮船，要时刻注意提防，以防他们的不轨行为。

^① (美)林乐知：《万国公报》，1874年。

第五，提出用招商局的轮船为抗战服务。郑观应深知轮船对于抗战胜利的重要性，因此，在战争之初，他就积极主张把招商局的轮船拨给官用军用。重要的是，他还在战争之初得知日本拟向外国借款 5000 万元，购买大铁舰 4 只，水雷船 20 只。便建议中国应像日本一样，也向外国借款 5000 万元，多购买一些铁舰、快船、水雷船、枪炮，以增强自己的实力。他还利用与中外人士广泛交往的各种关系，尽力为抗战服务。在开战之前，他即将日本增兵的消息报告清政府。有一次向盛宣怀报告说：日本有一轮船改名细普渡，由外国装满军械，约 8 月 17 日路经新加坡，请求清政府派兵截击，夺为己用。当时外间谣传日本有兵四五十万之多，海军兵舰如何多强，郑观应就此作了细致的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报告盛宣怀。他调查到的情况是：日方大小军舰如扶桑、吉野、高千穗共计 38 艘，并不比中国强多少，而兵力则远不如中国。他分析道，日本平时养兵 56640 名，有军务时可调兵 245310 名，另御林 5400 名。所谓日本有兵四五十万，都是虚作声势，不足信。这些对于消除畏日情绪，提高士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六，主张操练民团，以做重要的军事力量。早在中法战争中，郑观应就曾提出以练民团来补兵力不足。到十九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边疆危机更严重，他办民团的思想也更急迫。他说，英、法在缅甸和越南，俄国在西伯利亚修筑铁路，列强窥视祖国疆土之心、武力征服中国之行已不容忽视，为保家卫国，操办练民团则更是刻不容缓之事。甲午战争期间，当 1895 年年初日本进攻威海一带之际，他奏请清政府在沿海特别是在江南富庶地区尽快操办民团。此外，他还担心台湾乃一孤岛，易攻难守，估计日本可能进攻台湾，建议台湾巡抚唐景崧在台湾“广办民团”，以备不测。从这些建议、措施中看，郑观应确为有远见之人。

第七，在政治上积极呼吁变法，以此来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他在详细分析了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性和一致性以及国内经济和军事败退的形势后指出，无论与外国以何种方式议和，我国都不会再有高枕无忧之日。因此，我国应参照日本的变法，迅速作出变法救国的决议。出榜招贤，申明赏罚；仿照西欧军制，选定民团章程，就地练兵；建设工厂，多造枪炮，免去被外人挟制，多借外资，振兴实业；广办学校，培养人才。

这些主张、建议都是基于郑观应的爱国之深、救国之切，并在观察分析敌我

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分都具远见且意义深远。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程度不断加深的时代，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曾未间断过，要在每一时期、每一件事上都做到时时维护民族利益，提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方针、建议是极不容易的，而郑观应恰恰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二 促使郑观应社会角色转变的因素

纵观郑观应的一生，他将思想与实践紧密结合，在多种社会角色上虽多有交叉和转换，但都是颇有建树，从而构成了独树一帜的鲜明个性和明显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历史地位。总而言之，郑观应关心社会发展、忧国忧民、关心国计民生。受郑观应爱国思想的影响与鼓励，中国大地上有无数的仁人志士积极投身于救国和改革的伟大事业。郑观应的社会角色虽互有交叉有转换，但究其一生，他最重要的转变还是从洋行买办到爱国企业家的转变，在其转变的过程中既有思想变化也有具体实践。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促使他发生转变了呢？可以从四个方面作出分析。

（一）时代因素

十九世纪下半叶，日益衰落的大清帝国不断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武力侵扰，这一方面使中国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化的深渊，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天朝帝国与外界的隔绝状态，促使进步的士大夫们开始从历史的睡梦中惊醒，他们开始放眼世界，并积极地去探索富强救国之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更是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加紧侵略中国，他们寻找接口接连制造了中国边境上严重的边疆危机。此刻中华民族同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日趋尖锐，这促使进步的中国人不断地去理智地寻找现实而有效的保家卫国的道路。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特别是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入侵打乱了中国原有的经济秩序，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从而也加速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此时，先进的中国人已经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开始一步步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文化等，于是“西学东渐”出现并逐步成为了当时一股进步的历史潮流。西学一方面通过欧美传教士向中国传教的方式进入中国，另一方面也通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出使等方式带回中国。西学的传入为中国人接触、接受外国先进文化的熏陶提供了条件，也为追求进步、追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同时，俄国与日本通过学习西方，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技术等走上了富强之路，亦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去学习西方，去开拓未来的强国之道。

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进步的务实的知识分子们如冯桂芬、容闳、薛福成、马建忠、王韬、郑观应、何启、胡孔垣、黄遵宪、陈炽、陈虬、汤震等积极地寻求救国之道，他们开始致力于中国的改革、革新，因此，“维新”变法遂成为了“一时舆论之所趋向”，成为了“一时之世风”。^①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们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寻求富国强国之路为使命，开始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放眼世界。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内外联合，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各地人民起义，使清政府的统治秩序得到了短暂的稳定，由此称此时期为“同治中兴”。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入侵也不断地深入。但是，清政府仍然没有看到民族的危机，依然把视线放在了镇压各地人民起义上，处处加以防范，甚至对进步的知识分子们亦加以限制和摧残。但落后的清王朝是挡不住历史进步的脚步的，清王朝里部分进步的官僚、士大夫们也意识到了西方的先进、清王朝的落后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因此开始上奏朝廷，开始探索富强救国之路。由此在清政府里出现了“洋务派”，他们掀起了洋务运动，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思潮先后产生。如冯桂芬就感叹道：“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而上指者，则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②薛福成说：“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颺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将恃诈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智勇有时而并困，刚柔有时而两穷，被又设馆京师，分驻要口。广传西教，引诱愚民此固天地适然三气运，亦开辟以来之变局也。”^③郑观应也在《易言》中讲到：西方各国“叩关互市”、“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④这种“变局”对中国而言是利还是害？是祸还是福？王韬认为，这种“变局”对中国即有害亦有利，是祸同时也是福，关键在于中国自己如何去把握，他认为“善为用者，可以转祸为福，变弱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

^① 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76年版。

^② （清）郑观应：《易言》，北京：三联书店，1972年版。

^③ 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页。

^④ （清）薛福成：《应治陈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国之白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所以，“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白为。”^①郭嵩焘则认为：“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运，得其道而顺用之，亦是为中国之利。”^②晚清的进步知识分子们对这种“变局”的判断包含着一定的辩证因素，也表达了他们积极迎接时代挑战和变革救国的雄心，所以他们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认为，国家经济的兴衰关系着整个民族的兴亡，因而他们大力主张振兴民族工商业，主张国家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以此来抵制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同时，洋务派也看到了“人才”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因此他们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主张“人才兴国”。可见，师夷长技以求强、振兴经济以治富、变革科举兴学堂以造才，正是他们为解决当时中国的历史任务所提出的共同主张。

作为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热爱祖国，但也不讳言祖国的落后，认为要使中国真正富强，必须进行变法维新，所以，他主张变法维新，呼吁自强救国。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他不仅是改良主义者，更是爱国志士，他的思想和行为理所当然地具有了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此外，郑观应又是民族实业家，他洞彻天下大势，深谙商道，国难当头之际，爱国之情日深，痛恨外侮日切，所以，他提出“商战论”强调“以商立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③“商战论”的进步意义体现在：“它始终贯穿着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主张富强救国这一爱国主义思想；它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供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影响了以后许多杰出的爱国者和革命者”；^④它适应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步潮流，不但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要求，而且也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共同愿望，从而，也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商战论”可谓郑观应的救国战略，在其长期的实业生涯，他身体力行，将这一思想付诸于实践，一点一点成就了爱国企业家的社会角色。

^①（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②（清）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③（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④常汝琪：《郑观应的商战论》，《学术研》，1984年第5期。

在如此时代背景下,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得到强力人物的支持。在郑观应的人生历程中,李鸿章、盛宣怀对其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其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盛宣怀是天生的经商能手,是李鸿章的一只臂膀,也是李鸿章在上海的一只“眼睛”。郑观应作为李鸿章洋务派的骨干人物,屡屡得到李鸿章的提携。但是,郑观应在由买办商人向民族资本家的转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改良维新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与李鸿章的分歧有所扩大。如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他反对李鸿章在沪的“和议”活动,积极主张抗法并参加抵抗法国侵略的战争,他协助张之洞筹划从汕头运兵械增援台湾,还冒险亲自前往西贡、金边和南洋一带探查敌情,去香港购置军械、租船运送粮饷等,以致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度受到外商和洋务派的排斥和打击,弄到贫病交加,有苦难言。正如他自己所说:“年来命途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孥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反不如冲锋陷阵,效命尽忠,落得一身干净也。”^①郑观应与盛宣怀集团关系密切,郑观应之所以能够成为李鸿章洋务派的骨干人物,不可否认盛宣怀从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郑观应与盛宣怀在经济利益上密切联系,因而在诸多政治、经济问题上观点一致,但在实行立宪、设立议院等问题上,两人却有分歧。郑观应与李鸿章、盛宣怀的交往,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业和活动,但郑观应毕竟是一个以救世为志、反对侵略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和实践家,郑观应对李鸿章、盛宣怀虽有依赖,但并不迷信,尤其在爱国、救国等大事上更是表现出远见卓识和铮铮铁骨。。

(二) 地域因素

郑观应出生在晚清的香山,传统的香山文化对郑观应产生了积极影响。香山地理位置特殊,“自明清之际开始,……处于中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冲突与交流的风口浪尖,一举一动皆关乎国政,事无巨细往往直达朝廷”。^②香山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实际上是土著百越文化、中原文化、西洋文化、南洋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产物。香山

^① 郑观应:《郑观应致盛宣怀函》,1884年。

^② 马明达:《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版。

文化的辉煌既源自于香山得地利之便,又源自于澳门长期以来成为仅有的或极少的西方文化的桥头堡的作用。自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租住澳门后,澳门不仅成了西洋物质文化交流的中心,而且也成了西洋精神文化向中国传播的基地。西洋文化的渗透,为香山文化增添了新的视角和活力。“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香山人倍受西洋文化的熏染,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均比内地人士较早地发生了变化。“天圆地方和‘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中国中心观开始动摇,西洋政制、科技、宗教、教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长处,也为大多数香山人所了解,走出国门、探索世界的冲动和求新求异求强求富的欲望也不断增强。”^①“在香山文化的理念下,具有近代意义的商业文化的勃兴;以念祖爱乡为职志、充满家国情怀的华侨文化的形成,以中西碰撞为标识,以实践西方工商文化为要务的买办文化的出现,以价值观的重建为核心,以振兴中华为导向的革命文化的建立;以融汇中西先进思想理念为特色并在革命和建设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思想文化的诞生,都是近代以来香山人文化自觉和文化选择的典型表现。”^②

香山盛产买办,香山买办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能从国家和民族利权出发,因势而动,因时而变,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发展近代工商业,与外人争利,实现民富国强。他们的积极参与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创新精神,不仅开风气之先,而且还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树立了榜样,增强了当时中国人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信心,推动了中国工商企业的近代化。香山人的爱国传统强烈而又深厚,这种情怀在郑观应的一生中都有体现。因此不难理解郑观应在中法和中日战争中所做出的一系列爱国举动。

(三) 家族因素

郑观应的著作及涉及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还有关于其家庭和家族的资料。家庭、家族和郑观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郑观应身处何地,位居何职,家庭、家族始终是其魂牵梦绕的根。郑观应的家族庞

^① 黄启臣:《澳门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李宗桂:《香山文化的底蕴和价值》,广州:《南方日报》,2006年7月27日。

大，人员众多，通过郑观应家庭、家族的有关材料，可助于研究郑观应作为儿子、兄长、父亲等多重血缘身份，以及他以这多种身份处于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这种研究，从而使我们对历史研究中郑观应已有的买办商人、改良思想家、近代企业家的形象有更全面的了解，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更多的问题：如传统的家庭关系、家族关系是否影响了郑观应，使其没有成长为近代完全意义上的企业家？等等。因而研究郑观应与其家族、家庭这样的课题，就不仅具有历史学，还具有社会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意义，并有助于研究郑观应作为外国洋行买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民族资本家、洋务企业领导人等多社会角色的交叉和转变。

1. 郑观应和父亲郑文瑞

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1812-1893）号秀峰，居住在广东香山雍陌墟，为郑氏第二十一代，首先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1880年的《中报》丰满又生动地刻画了郑文瑞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郑文瑞又是商人，信奉儒家思想，他在经商致富的同时，常做使儒家思想通俗化的事情，兼做“睦姻任恤”等公众慈善事业。所以说，像郑文瑞这类兼为乡村知识分子的商人，既有进步思想又有具体实践，在当时对推动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设想，处在大清帝国末路时代的像郑文瑞，是“走近传统的边缘”的商人，在近代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受刺激性的变化，其思想和行为必将有新的突破。将这一背景作为理解郑观应人生道路最基本的出发点，有助于多角度、多方位地研究郑观应。郑观应在最初的科举失败之后，遵父命走上了经商之路，“年十七，小试不售，即奉严命赴沪学贾”。^①而当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买办商人后，又开始了著述出版活动。不过，由于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虽然他受到其父的影响也编了与父亲的《训俗良规》、《劝戒录》同样带有浓厚乡土和商人文化气息的书，如《道言精义》、《陶斋志果》等等。但是他关注的重点不再是传统的对世道人心的道德关怀，而是转向更广泛、更具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如他的《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均涉及到了中外政治、经

^① 易惠莉：《郑观应与他的家族》，《岭南文史》（纪念郑观应学术研讨会专号），2002年3月。

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还包括了他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批判和改良的观点及建议，也正是由于这些著作，奠定了郑观应作为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地位和后来爱国企业家的形象。郑观应的母亲对诸子“临歿遗令：‘惟肫肫以行善毋怠’”；其父则“每贻书诰诫，惟以勿忘母氏遗训为言”。^①与父亲具有“睦姻任恤”的作风一样，郑观应也乐于参加各种各样的赈济慈善活动。从1870年开始，一直到1922年去世，他多次参加在此期间中国各地发生的大灾荒的赈济慈善活动和爱国救国卫国活动。郑观应将他的这类活动视为“恪遵父训”，其实更有发扬光大的成分。他的这些活动得到了李鸿章等政府官员的好评，为他以后涉足政府的洋务企业活动铺平了道路。

在郑观应漫长的人生征途上，其父既商亦儒、仗义行善的历程和性格，不仅影响了郑观应的人生经历，也影响了他一生的行为处事。在郑观应心目中，他所在的上海始终只是他谋生之地，而其父所在澳门则不但是他生活的家园，也是精神的家园。如郑文瑞没有大富大贵的追求，当中国的对外贸易正从广州转移到上海，上海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商业大发展之时，而只有四十来岁的郑文瑞却于此时从上海告别买办商生涯回归故乡，放弃了发财致富从而成为一个商业资本家的追求。与其父一样，郑观应也无大富大贵的追求，在他的买办商事业最初成功之后，他却陆续将钱移为他用，如资助父亲在澳门建筑郑家大屋；寄钱回香山“欲仿范文正公设义庄”，教养“先祖鸣歧公子孙”；^②捐赠各种各样的赈济慈善活动。而未将所有的资金用于不断地扩大自己在上海的商业事业。由此可以理解，且不论传统的社会道德，但其父郑文瑞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影响，使郑观应最终没有成长为近代完全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走向了近代爱国企业家的行列。

2. 郑观应和诸兄弟

郑观应共有兄弟九人，他排行老二，由于哥哥过继给伯父，郑观应实际上成为了家里的长子。郑观应和哥哥郑思齐、弟弟郑思贤三兄弟系出一母，其余的六个弟兄都是继母所出。作为长兄，郑观应要担负其家庭的担子，这也是他早年“弃

^① 易惠莉：《郑观应与他的家族》，《岭南文史》（纪念郑观应学术研讨会专号），2002年3月。

^②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学经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 1870 年年末，郑观应和哥哥郑思齐、弟弟郑思贤分别以捐纳的方式获得“三品衔候选道”、“分发江苏候补道”、“江西候补知府”衔，这样兄弟三人算是进入了政界。^①之后，在其父的安排下，他们三兄弟分别到上海、九江、汉口三地积极组织参与那里的赈灾捐纳活动，因此得到了政府的嘉奖，也为家族争得了荣誉。自 1880 年年初，郑观应相继出任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企业的要职，并成为了上海协賑公所的领导人物。同时，作为长子的郑观应没有忘记自己在家族中的责任，在事业好转之后，他开始不遗余力地提携自己的各位兄弟，并且还对自己的孩子加以照顾。如 1882 年年初，郑观应负责汉口及浙江的电报线路事业，弟弟郑思贤因他而被列入其内共同经营电报事业。1890 年年初，郑观应在以招商局会办的身份视察长江各港口之时，推荐其二弟郑官桂出任管理九江分局，之后又多次向盛宣怀提出该请求，从而为郑官桂后来担任招商局九江分局的总办奠定了基础。在 1900 年，郑观应还曾以身体欠佳为由，向盛宣怀提出要退居二线，推荐郑思贤来接替他在招商局帮办的职位。重要的是在 1914 年郑观应立遗嘱之时，虽然弟弟郑思贤尚在，但是他还是在遗嘱中表明：每年给弟弟郑思贤的“两子读书费二百元，按季照送”。^②作为长兄，郑观应自始至终都在照顾自己的兄弟们，在家族、家庭中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3. 郑观应和儿子郑润林

郑观应原配妻室莫氏生两子均幼殇，继室赵氏生长子郑润林，三妾叶氏生次子郑润潮和长女，六妾生三子润炎、四子润鑫（又名郑景康，我国著名人像摄影家，他于 1944 年为毛泽东拍摄了第一张标准像，于 1964 年为毛泽东拍摄了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标准像）和次女。郑观应虽然儿女较多，但与之事业的顺畅相比，儿女可谓姗姗来迟。郑润林是其长子，甚得郑观应的疼爱。润林的堂兄们在早期“拙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③走的是与祖、父辈们相同的道路，有科举道路上的初步成功者。润林较之这些堂兄要小

^①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6 页。

^② 易惠莉：《郑观应和他的家族》，《岭南文史》（纪念郑观应学术研讨会专号），2002 年 3 月。

^③ 《同人公启：郑秀峰先生八旬开帙征诗启》：《申报》，1882 年 9 月 16 日。

许多，时代的变迁以及祖父的年迈都意味着他早期的教育状况必然地会有所改变。虽然如此，但润林的早期教育仍与郑氏家族传统以及广东地方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润林读中西书多年，并留学日本，但在其受教育的关键时间，未能随父一同来到更具新式教育条件的上海，因此，润林的早期教育应该仍然受到了“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传统的影响。及至润林违背郑观应的意愿，“不肯入实业专门学堂学成一艺以谋生”，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润林缺乏近代性质的早期教育准备。^①除了教育，郑观应还对润林的工作、生活、婚姻等方面给予了关注。“1901年郑观应年六十，在澳门为年仅十八岁的润林娶亲，而后安排他赴日本留学。”^②1906年润林留学归来，郑观应又为其谋职之事操劳。同年，润林任营口关道译员。1910年，润林积劳致疾，乞假旋沪就医。同年秋，郑观应请求盛宣怀为润林谋职。同年11月，郑观应得厦门招商局差事，便将此职转给润林，由此润林赴厦门主持局事。然润林由于“咳病尚未痊愈”，在他主持厦门局的四年间，经常不得不往澳门或上海养病。厦门局务事实上是由郑观应的九弟郑庆余实际掌控。^③1914年，润林则因在厦门分局有“修船费失察事”之过而被免去招商局内的职务。郑观应因此批评润林说：失职乃“由于自己用人不慎，学问历练精神均不足，又不能忍耐与帮办和衷共济也。……应返澳养病，宜节欲寡言，俟病痊而后谋一相当之席位，不可奢望。”^④1916年润林“抑郁吐血而死”，郑观应受失去长子的打击，精神上进一步颓废，而一度深陷于道教修炼活动。

总的来看，在传统的家族关系、家庭关系的范畴内，按照传统的道德规范（“修身”、“齐家”）来评价，郑观应是一个称职的儿子、兄长和父亲。特别是他在1914年的遗嘱给研究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全家老少在他故世后的周到安排，进一步体现了他“老者有所养、未成年者有所教且有所发展”的美好意愿。我们不难看出，传统的社会道德在家族、家庭观念上赋予了他很多的责任，他也时刻铭记并勉力承担这些责任。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郑观应以他在近代事务方面的远见卓识、丰富经验以及勇于实践，不但足以使他创立一份令世人瞩目的个人事业，而且也使他具备了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作出更积极贡献的可

^①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5页。

^③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31页。

^④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能性。传统道德中的家族、家庭观念激励了郑观应去谋取个人事业的发展，去光宗耀祖，去封妻荫子，但来自家族、家庭的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又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他个人创业的信心和精力。郑观应在晚年明显地意识到，传统社会的家族、家庭观念象枷锁，制约了个人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贡献，家族主义的处世立场有悖于国家和公众利益。郑观应在晚年作品中对家族、国家观念关系予以特别的关注和强调，表明他直到晚年思想也未落伍，也表明他的一生既与家族和家庭密不可分，又与国家和社会息息相关。郑观应始终没有放弃作为个人对社会和国家无私奉献的信念，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信念愈加强烈，从而促使他义无反顾地投身爱国救国实践。

（四）性格因素

郑观应阅历丰富、履历不凡、个性鲜明，鲜明的个性的是其社会角色转变的重要因素。首先，郑观应的一生都在动荡和战乱中度过，饱受内忧外患的煎熬。他幼读孔孟之书，少有爱国大志。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异国外埠，身份不一，阅人无数。他关心时政，热心西学。他睹西方之发展，叹祖国之落后，谋国家之富强。其所历所闻甚多，所感所思甚切，使他的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产生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如刺哽喉，不除不足为快，促使他从小译员到封建买办，从封建买办到近代商人，从近代商人到爱国企业家，一点点完成转变。其次，“敢为天下先”是广东人鲜明的性格特征之一，郑观应是广东人中的广东人，更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英锐豪气。他不满社会现状，虽然寄身买办阶层，但和一般买办并不气味相投。他推行维新改良，张变革以御外侮，和洋务派既合作共事也有观点上鲜明的冲突。他爱国忧时，其《救世揭要》、《易言》、《盛世危言》以“救”、“易”、“危”等字眼入题，无不体现了他作为忧患之士的思想脉动。他洞见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讳言中国之落后于西方，倡导社会之全面改造。祖国的独立和富强，是他一生不懈的探索与追求，特别是在国难当头之际，这种探索更加积极，这种追求更加猛烈，所以，他改良以求变，著书以唤众，赈灾以助民，商战以救国，参战以保国。他善于创新，精于总结，更敢于实

践。“思想与实践相结合，构成了郑观应坐言起行的鲜明个性。”^①“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鲜明的个性是强大的原动力，最终促成了郑观应社会角色的伟大转变。

^① 刘圣宜：《近代强国之路的探索者(郑观应)》，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三 郑观应的思想主张和社会角色转变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意义

中国的落后,使郑观应的爱国情缘油然而生,随之萌发出与洋人争利、富强救国的理想和责任感。急于改变中国现状的他以图通过总结提炼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传播西学和新思想来改变国人落后的封建意识,进而实现其“工商立国”的宏愿。郑观应在积极投身实业的过程中,其社会角色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再来看郑观应的思想,会发现其仍与当今社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工商同等重要,要发展工商必须重视人才和教育,发展商业必须按照国际惯例来运作,同时还要善于向西方学习,必须有开放的心态等等,都与今天的改革开放有着众多相似之处。从郑观应身上,我们今天还能学习和借鉴到很多的东西,比如我们把开放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当今社会虽然日益开放,但仍有不少人只善于“拿来”,却不善于创新,郑观应在“拿来”中借鉴,从实践中提炼,会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一) 郑观应富强救国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19世纪下半叶,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认为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西方殖民者的“船坚炮利”,认为只要改进清军的武器装备就可以自强。他们把武器问题视为自强的关键,为此掀起了兴办军事工业以“求强”的一系列活动。这时在上海的郑观应却提出:“强兵之道,着在理财”的看法。^①他认为改进武器装备是必须的,但却不是根本。只有解决了理财问题,使财政宽裕,才能饷多粮足,才能购器练兵,也才能达到真正的“强兵”。郑观应以六十多年经营近代工商交通企业的经验体会,长期任买办和一生为商的经历,将西方资本主义对我国侵略的方式和手段,概括为“兵战”和“商战”,即军事侵略与经济侵略,并对比加以分析,认为后者比前者有更大的危害性和隐蔽性。他写道“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国,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

^①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页。

^①他力主用“经济战”来对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极力主张仿效西方在国家扶持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并认为这是国家富强之道，也是“商战论”的要义。郑观应把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用来对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高到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商战论的提出，在当年对朝野影响很大。就是在今天，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理论在许多方面仍然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芒，对我们仍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郑观应的富强救国论主要是倡导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使国家富强起来，打败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他极力主张让国人自由投资兴办新式工商业，这样就壮大了民主资产阶级的力量。由于民族资本不断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压迫和打击，民族资本家迫切希望国家政权给予扶持和保护。清政府却对民族资本家“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②郑观应起初对李鸿章等官僚实行的“官督商办”企业经营方式，曾抱有很大的期望。郑观应也因此曾以商股身份积极参加“官督商办”的企业，并鼓吹要以此作为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好办法。及至后来他看到了因封建官僚机构控制“官督商办”企业而滋生的诸如专制、特权、贪污、浪费等诸多腐败现象，并深受其害，遂对“官督商办”大失所望，进而给予深刻揭露。他主张废除“官督商办”，“民办”一切企业，即让民族资产阶级自由投资和独立经营一切企业。他写道：“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③郑观应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在《盛世危言》中提出了一系列大力扶植、保护与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与举措，如实行保护关税，提高洋货进口税降低或废除土货的厘金和出口税；制订和颁行公司法，允许私人集股成立股份公司，国家按条例给以保护；奖励民族工商业的发明创造，并实行专利权；制订和颁行商标注册条例，保护商标所有权；举办博览会，促进国内物资技术交流；允许商人组织和加入商会；国家另设商部，并吸收商董参加，专门处理发展实业问题等等。郑观应所提出的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②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主张,反映了当时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是同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今天,个体、私营工商业者问题,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郑观应所提出的主张不能说不具参考价值。

郑观应的睿智,不仅在于他看到了商战的重要,并制定出商战策略,还在于他看到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影响商战的主要因素。他的重商主张和建议在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和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普遍关注。这说明他的思想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不但冲击了封建政府一贯的“重农抑商”国策,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并且对以后清王朝制定经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许多措施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都或多或少受到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派思想的影响。他在《盛世危言后编·白序》中指出:“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他认为,要发展科技和工商业,必须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新的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要建立西方式的议院制度,开设议院,实行立宪。这是中国在甲午海战之前要求中国实行议院制,放胆攻击皇权的第一人。郑观应并不是空论议政,他提出了一整套内政改革的保证措施,涉及吏治、教育、用人、刑法,办报、盐务、漕务、治河、旱潦、救灾、济贫等众多方面,并皆有周密详尽的论述。其中,为了达到商战取胜的目的,郑观应始终如一地强调“人才”和“资本”。他一直呼吁:“国之盛衰系乎人,实业之成败系乎人”,借材异域只是暂时措施,一定要立足于自己培养,不能培养适应改革的人才,不管多么完美的理想,都将成为空想。“所以他把《学校》篇置于《盛世危言》中的突出地位,提出废八股文,学习技艺等实用之学,改旧式书院为学堂,并身体力行地办电报矿务学堂、招商公学,和在汉阳铁厂办半工半读技术大学,培养大批新型人才。”^①关于资本,他认为发展实业必须有充裕的资金。资金的来源既要内部解决,如设股份公司以集股金,设银行以将社会闲散财富集中起来,用于急需的实业,还要借助于外力,吸引外资,以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当今中国,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教兴国,教育优先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等等。站在发展战略的角度,再来思考郑观应关于“教育”、“人才”和“资本”所提出的主张,回顾他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会发现,他的“教育论”、“人才论”和“资本论,无不与今

^① 夏东元:《郑观应与中国近代化及其超前意识》,《社会科学》,1992年第11期。

天的国家战略有着相近之处。因此不能不说郑观应的这些主张对于我们国家的建设仍具有有益的启发意义。

（二）郑观应思想主张及其现代启示

郑观应不仅是近代成功的实业家，而且是爱国的进步思想家。一生著过三本书，1873年的《救世揭要》，1890年的《易言》，1892年的《盛世危言》，《盛世危言》是对《救世揭要》和《易言》的修订和扩充。

《盛世危言》一书充分体现了郑观应忧国忧民、竭力拯救中国的思想。《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也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郑观应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由于政治制度的落后，他在《盛世危言》中说：“窃谓中国之病根在于上下不通，症成关格，所以发为痿痹，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设议院不可。有议院落则捐苛禁，破障界，敦睦守，公黜陟；且借以收民心，筹捐款，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从前民间举动，虽合公理，顺人心，苟与政府意见相背，小则斥为惑众，大则指为叛逆。白疆吏以至州、县，但知仰承意旨，虽明知其冤，不敢代白。甚至藏弓烹狗，诛戮功臣，酷吏权奸，残害忠荃，数千年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若设议院，则公是公非，奸佞不得弄权，庸臣不得误国矣。”^①他针对当时中国的国情，提出建立君主立宪的代议制民主政体，他指出“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僉国：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②在官吏的任免上，他还提出民主选举的建议，他说“夫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举白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白众人，

^①（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2页。

^②（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1页。

贤否难逃公论”。^①在经济上郑氏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最重要的是他提出“商战”的思想。所谓“商战”是指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前提下，扩大出口，限制入口，堵塞漏卮，换回利权，抵制外国资本的经济侵略，摆脱中国成为列强“取材之地”、牟利之场的处境，实现“国势日强”，“民生日富”的局面，从而达到“固本”之目的。^②在教育上，郑观应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见解。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③他主张学习西方，实行义务教育制，指出西方各国的教育体制是“由地方官集资经理，无论贵贱男女，自六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④他还提出：“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提出在国民中普及教育，主张妇女应与男子一样受教育，并反对妇女缠足，同时还提出了职业技能的培训和教育的思想。^⑤在司法上，他指出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的运用无不体现了黑暗与残暴，他指出“中国三代以上立法尚宽，所设不过五刑。读《吕刑》一篇，虽在哀世，犹有哀矜惻怛之意。自后一坏于暴秦，再坏于炎汉。有罪动至夷三族。武健严酷之吏相继而起，大失古人清问之意。”^⑥他谴责中国司法制度的黑暗，在《盛世危言》“狱囚篇”中他说：“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务喜。’哀痛惻怛，诚仁人之用心也。盖人生不幸，父母失教，既无恒产以资历事畜，复无技艺以给饔飧。贫困无聊，流于匪类；致罹法网，横被官刑；土室棘垣，暗无天日；赭衣黑索，惨受拘挛。禁卒毒若虎狼，秽气积成疠疫。白斩、绞以下诸罪人本无死法，而久系痍毙者往往有之，其冤惨可胜言哉？”^⑦还特别谴责了中国司法过程中的刑讯逼供，他说：“夫天地生人，原无厚薄也。何以案情讯鞫而酷打成招，独见于中国？夫三木之下，何求而不得？抑岂各国之人皆纯良，

^①（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页。

^②（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6页。

^③（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页。

^④（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266页。

^⑤（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7页。

^⑥（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9页。

^⑦（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5页。

而我中国之人独凶恶，必须施以毒刑，而后可得其情欤？”^①所以须得向西方学习，他说“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②此外，郑观应还在新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及建议。

郑观应关于商战的思想体系是完整的，他认为，只有发展近代工商业并在国外商战中获胜，才能达到富的目的；只有富，才能真正的强。不但在经济力量上如此，而且在军事技术上也是如此；整个工业水平提高了，军事技术才能提高。不注重商战而单搞兵战是绝对不能强国的。他说：“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若舍本而求末，入不敷出，徒知聚敛，不复开源，转令民不聊生，盛亦难恃。如花树无根，虽暂华而旋槁也必矣”。^③他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时代”，封建自然经济的农本观念无助于国家的强盛，反而是国衰民贫之源。要在世界新潮中自立，必须树立以商为本的思想观念，欧美之所以国力上比我们强大，就在于双方在对商务的重视与否上存在差距。在具体的经营操作中，他很注重把自己的企业经营模式与别人或别国的进行比较，做到心中有数。例如，他曾肯定过官督商办的形式，但是在不断的对比实践中发现，这种形式也有许多弊端：首先是“官夺商权”；其次，官督商办体制导致企业管理不善，浪费严重，效益低下；其三，官督商办形式由于涉及政治关系较多，因而在处理中外经济交往问题时受制于上，不能真正维护华商的利益。官督商办的形式，显然不能与西方的“自由式”管理相比。另外，郑观应强调知己知彼，不光要对本行业充分把握，也要注重其他事项的状况，如国家财政收支、工业生产、农业生产、金融货币等。要对整个社会、整个国民经济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才能利于制定自己本企业的发展战略，不至于是“纸上谈兵”，落个“壮士未捷身先死”之叹。郑观应经商成功之道，也是我们应该借鉴并加以吸收的智慧和谋略。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后编·白序》中说：“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④这正是他思想结晶之所在。从1873年出版《救时

^①（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0页。

^②（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9页。

^③（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④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揭要》倡言救国，到 1880 年出版《易言》呼吁学习西方，到 1892 年《盛世危言》问世呼吁变法，与同时代思想家相比，郑观应把御外侮、振工商、改良政治三者统一并有机地联系起来如此论述，实属罕见。他是“爱国三层次”统一于一身的先进人物。在郑观应一生的历程中，他一方面积极参加中外的近代工商业活动，另一方面不间断地关心思考中国的命运。他对中国社会的关怀和积极参与的精神令人敬重。无论是他的改良思想，还是他那种爱国的情热都对我们投身当今的改革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郑观应社会角色的转变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来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积聚直到甲午战争，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人士所提出的政治民主、发展近代工商、社会平等、肯定人的自由权利等一系列新思想，标志着中国近代观念的初步形成。在这些近代观念和时代环境的刺激下，郑观应逐步从买办转变到爱国民族企业家，他的这种角色转变历程虽可谓“任重而道远”，但却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他认为要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就必须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且要身体力行。他关心国家大势，指出：“古之边患不过一隅，今则南、北、东、西几成四逼矣，……是以防边之道，虽以防俄为急，而英法亦不可不妨。”他“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①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清政府的媚外卖国表示不满，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要求取消外国在中国的特权。从这些要求中都可以看出郑观应所流露出的拳拳爱国之心，民族的自立自强始终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在。同时他敢于冒生命危险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与侵略者作坚决的斗争，为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尽一位赤子的职责和爱国情怀。

其次，郑观应是第一个颠倒了中国有史以来“士农工商”职位序列的知识分子，他放胆抬高了“商”的地位，而且身体力行，弃文下海经商，要求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士”的地位是最高的，“商”的地位是最低贱的。但正是被中国传统所不齿的外国商人敲开了东方帝国“固若金汤”的

^①（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8 页。

封建城堡。历史也给饱读诗书的郑观应提供了一个机会，使科举落第的书生郑观应变成了新型商人。郑观应对封建的“贱商”观念提出挑战：“古有四民，商居其末……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位！”^①因此他呼吁，填平横在“士”“商”之间的等级鸿沟，达到“士”“商”完全平等的社会现实，“一变隆古之习，视商如士”，^②并且明确表示“作商得财，人皆仰之；作官得财，人皆鄙之”^③，也就是说，做生意赚钱比做官搜刮老百姓钱财要强得多。郑观应重视商人的思想是对封建传统观念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也危及到了封建主义王朝的统治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郑观应的思想具有反封建传统的特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共同愿望，而且也符合当时中国人民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从而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郑观应认为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华经济掠夺，从而把发展中国民族资作为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随即提出“商战”口号，形成“商战固本”思想。其基本观点是：为了抵御外侮，要注重兵战，更要注重商战。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根本目的，在于掠夺中国的资源、工业原料和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制服之法，是兴商务、习“商战”，“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④在郑观应看来，“制西人以自强”是政治目的，“振兴商务”则是为了达到这一政治目的的手段，自己有了实力就能“制西人”。不难看出郑观应在他的实业活动中已经充分认识到“实业救国”的重要性，发展实业不仅可以固本，而且可以兴邦。中国要想“自强以制西人”，必须重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影响下，正在“全心全意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努力进行和谐社会的构建，整个社会都处于良性运转之中。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打开国门“走出去”，敞开胸襟“引进来”，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以积极的姿态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再次，他始终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一名改良主义思想家，他“心怀祖国，胸装天下”，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成是自己救国救民的一种使命，并且

^①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 （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始终将这种使命作为自己“实业救国”的指导方针。因此就不难理解它在买办生涯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爱国举动，如从 1870 年直至其去世不间断的从事慈善活动，中法、中日战争期间频繁上奏朝廷，阐述其积极抗战、保家卫国的思想。在中法战争爆发之际，甚至还主动要求去越南调查敌情，为抗法清军提供各种援助。郑观应通晓西洋政治经济，又谙熟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国情。经过反复比较研究，他选择了“君主立宪”的改革方略。在今天一些学者看来，“君主立宪”制似不如“共和制”更为先进，“改良”不如“革命”更为先进。但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不难推断，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主张却是更符合中国国情民意，更利于连通政府和广大百姓，更易于操作施行，更易于不动声色地消解封建专制与独裁，会以最小的代价而获得最大的收益。郑观应处于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中，是在经史教育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本身又是由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本家，他的一举一动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但他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他的“振工商以攘外”思想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极大地振奋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充分表达出爱国志士维护国家权益和捍卫民族利益的正义立场，仅此一点，就值得后人大加称颂。郑观应“既作洋办，又作中办，既搞经济，又搞政治，既忧民，又助君，既连结商民百姓，又连通官府要员，既有文功，又习商战，既务虚，又务实，他将学者的智力、政府的权力、企业的财力，多力合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瓦解中国的封建专制，推进中国的改革，推动资本的滚动发展，致富致强，抵御外侮，拯救中国”。^①这期间，他表现出了出色的学识综合才能、出色的管理才能和出色的社会斡旋才能。尽管在买办之路上荆棘丛生、道路曲折、磨难重重，但郑观应以一贯之的“救世”思想却一直在激励着他，使他最终从买办生涯走向爱国实践，也正是他这种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情怀使他完成了社会角色的转变。

^①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结 论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出身于买办的改良主义者、民族资本家、爱国企业家，堪称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郑观应的一生多姿多彩，履历不凡，曾两任买办，三进上海轮船招商局，数度进出于洋务派企业，数十载年经商，屡屡投身赈灾慈善和保家卫国活动。他思维超前，认识敏锐，不仅工商业经营实绩出众，而且维新思想卓有远见。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最重要的代表作《盛世危言》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维新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相当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以拯救民族危亡”^①是郑观应最强烈的愿望，为了达到“富强救国”的目的，他一生孜孜以求，广泛参与社会实践，特别是经营近代工商业，并逐步实现了由买办到爱国企业家的身份转变。

作为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改良主义者，郑观应认为要使中国真正富强，必须进行变法维新。他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极力呼吁自强救国。“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具有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当时广大爱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并对以后的改良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说，郑观应的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②此外，郑观应主张跟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商业竞争，运用经济手段来抵制外国侵略。他强调“以商立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他的“商战论”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主要体现在：它始终贯穿着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主张富强救国这一爱国主义思想；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并且还影响了以后许多杰出的爱国者和革命者，如孙中山、毛泽东等等。郑观应的“商战论”把限制和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洋务派官僚垄断政策作为“商战”的首要前提，这种抑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商战思想”，

^①夏东元：《郑观应传》，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

^②常汝琪：《郑观应的商战论》，《学术研》，1984年第5期。

适应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潮流，不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要求，而且也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共同愿望。从而也“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①

郑观应以一位从洋行买办向近代商人、从传统知识分子向爱国企业家转变中的形象，成为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进程中留下深刻痕迹的历史人物。

^① 夏东元：《郑观应传》，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

参考文献

一、专著

- [1] 夏东元：《郑观应传》，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
- [2] 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版。
- [3]（清）郑观应：《易言》，北京：三联书店，1972年版。
- [4]（清）薛福成：《应治陈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5] 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6]（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 [7]（清）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8] 易惠莉：《郑观应与他的家族》，广州：《岭南文史》（纪念郑观应学术研讨会专号），2002年3月。
- [9]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 [10] 朱有曦：《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11]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12] 北华捷报馆：《北华捷报》，1850年。
- [13] 邵循正：《论郑观应》，北京：《光明日报》，1964年。
- [14]（美）林乐知：《万国公报》，1874年。
- [15] 夏东元：《郑观应思想发展论》，北京：《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
- [16]（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 [17] 马明达：《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版。
- [18] 黄启臣：《澳门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18] 刘圣宜：《近代强国之路的探索者(郑观应)》，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二、硕士论文

[1] 冀海银:《郑观应教育思想研究》,河北大学,2004年。

[2] 李锐:《试析郑观应的海防思想》,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

三、论文

[1] 王杰:《郑观应研究的里程碑——“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岭南文史》,2002年03期。

[2] 王丹:《浅评郑观应的女子教育观》,《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03期。

[3] 郑世巧:《浅析郑观应的教育思想》,《科学咨询(教育科研)》,2008年02期。

[4] 刘振宇:《郑观应职业教育思想简论》,《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10期。

[5] 张君玉、李锋:《郑观应的教化思想》,《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2期。

[6] 冯雷:《浅论郑观应的教育观念》,《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

[7] 周冬梅:《郑观应的女子教育观——兼与孙中山的女子教育观比较》,《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2期。

[8] 王令云:《郑观应职业技术教育思想初探》,《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01期。

[9] 管林:《试论郑观应的教育思想》,《岭南文史》,2001年03期。

[10] 吴艳杰:《郑观应“商为国本”思想浅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1期。

[11] 孙玉珂、李玉传:《略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02期。

[12] 汤照连:《郑观应:近代“商战论”的主要代表者》,《岭南文史》,2001年03期。

[13] 谢毓洁:《评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2期。

[14] 郭红娟:《试述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 01 期。

- [15] 范耀登:《略论郑观应的行政管理思想》,《岭南学刊》,2001 年 01 期。
- [16] 杨华山:《论中国近代早期的企业人才观念和市场意识——郑观应个案分析》,《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年 03 期。
- [17] 线文:《郑观应、李斯特经济思想比较初探》,《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 01 期。
- [18] 聂好春:《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从〈盛世危言〉看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 03 期。
- [19] 赵善轩:《郑观应“专利经营”建议及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实践》,《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 年 04 期。
- [20] 童远忠:《郑观应边防思想述论》,《军事历史》,2004 年 04 期。
- [21] 吴沙:《论郑观应的警政思想》,《公安研究》,2001 年 07 期。
- [22] 朱作鑫:《论郑观应的警政思想》,《辽宁警专学报》,2007 年 01 期。
- [23] 冷光伟:《郑观应警政思想述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 06 期。
- [24] 朱作鑫:《论郑观应的监察吏治思想》,《岭南文史》,2007 年 01 期。
- [25] 刘倩:《从〈盛世危言〉看郑观应的法律思想》,《兰台世界》,2008 年 05 期。
- [26] 孟红:《郑观应法律思想简论——以〈盛世危言〉为研究对象》,《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 01 期。
- [27] 熊命辉:《论郑观应的国际法思想》,《株洲工学院学报》,2005 年 02 期。
- [28] 龙天贵:《郑观应法律思想述评》,《贵州社会科学》,2005 年 02 期。
- [29] 施建兴:《略论郑观应司法改革思想》,《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 04 期。
- [30] 乔素玲:《郑观应与西方法律观念的移植》,《岭南文史》,2002 年 03 期。
- [31] 王超:《浅议郑观应的救荒思想》,《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 年 01 期。
- [32] 张大伟:《郑观应防灾备荒思想探析》,《岭南文史》,2006 年 04 期。
- [33] 钟霞:《论郑观应的荒政思想》,《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 年 06 期。
- [34] 余新明:《郑观应救助弱势群体的策略分析》,《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

- 科学版)》，2006年04期。
- [35]刘正刚：《郑观应关注弱势群体言行探析》，《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03期。
- [36]田珂：《论郑观应慈善思想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启示》，《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06期。
- [37]陈国威：《试论郑观应的慈善观》，《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3期。
- [38]李宗桂：《香山文化的底蕴和价值》，《南方日报》，2006年7月27日。
- [39]倪俊明：《郑观应研究综述》，《文史哲》，2003年01期。
- [40]童远忠：《郑观应边防思想述论》，《军事历史》，2004年04期。
- [41]李天莉：《郑观应医学思想简析》，《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1期。
- [42]陈传：《郑观应——倡导中西医合璧的先驱》，《岭南文史》，2002年03期。
- [43]伍国：《郑观应思想中的“体用”与“道器”》，《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01期。
- [44]夏维奇：《试论郑观应的电报建设思想与实践》，《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02期。
- [45]朱根：《郑观应的日报观论略》，《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6期。
- [46]伍国：《郑观应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岭南文史》，2005年04期。
- [47]刘应芳：《郑观应的现代图书馆思想》，《图书馆学刊》，2005年03期。
- [48]汪菁华：《郑观应外交思想述论》，《安徽史学》，2001年03期。
- [49]张泽洪：《郑观应的政治改革观》，《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02期。
- [50]姜义华：《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
- [51]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杰出历史名人与澳门(3)郑观应》，2006年11月8日。
- [52]常汝琪：《郑观应的商战论》，《学术研》，1984年第5期。

致 谢

三年的高硕生活即将结束。三年来，有很多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在论文即将付梓之际，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吕伟俊教授。论文从开题到截稿，从理论到文化方面的启发，直至具体问题的指教都饱含着他的心血。特别是在论文的最后完成阶段，吕老师更是从繁忙的教学科研事务中挤出时间对我进行悉心指导。吕老师丰厚的学术底蕴，严谨的治学作风，诚恳的做人准则，务实的处事态度，都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和启迪。正是他深入浅出地谆谆教诲，使我一次次从研究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正是他春风化雨式的循循善诱，使我能够在人生的旅途上顺利迈上新的台阶。感谢恩师！

其次要感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老师们，是你们引领我步入新的知识领域，使你们为我开启了另一扇思想大门。

还要感谢山东大学图书馆，给我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资源和良好的学习环境。

薛海峰

2008年9月于青岛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论文评阅人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 务	是否博导 (硕导)	所 在 单 位	总体评价*	
答辩委员会成员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 务	是否博导 (硕导)	所 在 单 位		
	主席					
	委 员					
答辩委员会对论 文的总体评价*			答辩秘书		答辩日期	
备注						

*优秀为“A”；良好为“B”；合格为“C”；不合格为“D”。